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东汉
士

风
与
文
学

蓝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

DONG
HAN
SHI
FENG
YU
WEN
XUE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东汉士风与文学

蓝 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汉士风与文学/蓝旭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02-004485-9

I. 东… II. 蓝… III. ①士风-研究-中国-
东汉时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2909 号

责任编辑: 宋 红

责任校对: 宋 红

责任印制: 周小滨

东汉士风与文学

Dong Han Shi Feng Yu Wen Xue

蓝 旭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2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485-9/B·306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般认为以建安为开端的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认识自鲁迅先生提出后,迭经近世学者补充、丰富,至今仍被普遍沿用。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文学自觉”,指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摆脱政治、教化等功利主义的束缚而发现自身的审美特征,获得独立的发展;文学自觉的到来,则与士人个性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以此为参照,两汉文学依附政治和经学的功利性质便显得格外突出。

然而,任何新事物的形成都有其逐步积累酝酿的过程,“文学自觉”亦非突如其来。历代学者在肯定东汉文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之外,也已注意到其有异于此前的某些新特征。如范晔修《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显然基于东汉有别于经生而以文名世的文人群体的形成这一事实。由此而制作渐夥,文体增繁,“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①。故清人章学诚乃断言:“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

^①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虞创为《文章流别》，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① 这里指出文集之“实”具于东汉至建安、黄初之间，不仅可见东汉一朝文学创作的繁荣，也说明文体辨析的观念、乃至把文学和其他学术门类加以区分的观念初步形成^②。至于文学创作中体物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五言抒情诗的成熟，向来也被认为是魏晋文学的先声。这些新现象，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东汉文坛正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蓄积力量。

魏晋思潮与士风中的某些因素，亦每可于东汉寻其端绪。范书新辟《独行传》、《逸民传》，学者多见隐逸、任诞之风畅于东汉，并已初具魏晋名士某些思想性格的萌芽^③；《世说新语·夙惠》以上十二篇，多自汉末名士叙起，知汉末清议与人物品题有以开魏晋清谈之风^④。余嘉锡先生甚而断言：“盖魏晋人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⑤ 经学章句之式微、师法家法之松动，论者以为肇自东汉初年删减章句之风，而大著于和、安以下^⑥。与此相联系的，则是老庄之学渐广流传。汤用彤先生尝言：“溯自扬子云以后，汉代学士文人即间尝企慕玄远……则贵玄言，宗老氏，魏晋之时虽称极盛，而于东汉亦已见其端矣。”^⑦

凡此均为治东汉文史者熟稔，而士林新风与文学新貌同时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文集》296页，中华书局1994年。

② 章氏此说，实肇自明人胡应麟：“西汉前无集名，文人或为史，或为子，或为经（经解如董、毛类），或诗赋，各专所业终身。至东汉而铭颂疏记之类，文章流派渐广，四者不足概之，故集之名始著。”（《诗数·杂编》卷二）

③ 参见曹道衡《〈风俗通义〉和魏晋六朝小说》，《文学遗产》1988年3期。

④ 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41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⑥ 参见马宗霍《中国经学史》5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700—70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 《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学术论文集》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

发端于斯世,二者之间必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把这种关系揭示出来,具体阐发东汉士风对文学的影响,描述“文学自觉”在东汉的酝酿过程,是本书的主旨。这一课题已逐渐引起时贤关注,就笔者翻检所及,迄今为止有关东汉士风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阐述较为深入的是文人与儒生的分化、文人群体的形成、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书拟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士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题材、主题、表现手法、文体沿革等角度考察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和审美趣味,探讨士风的变迁对形成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的影响。相关论著,正文中陆续有所征引,或沿用其说,或商讨辨析,均曾使我受益,凡所参考引用,一一注明出处,示不掠美。以下再对研究范围和方法略作说明。

本书论述的时代断限,从王莽专权前后到献帝建安前夕约二百年。依据士风和文学的阶段性特点分四期:第一期两汉之际,从西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驾崩、王莽为大司马前后,到建武十二年(36)刘秀灭公孙述,统一中土,约四十年;第二期东汉初叶,从建武十二年到和帝永元(89—105)初,五十余年,大致相当于史家所称“光武、明、章之治”。第三期包括东汉中叶和、殇、安、顺、冲、质诸朝(89—146),近六十年;第四期为汉末桓、灵之世迄于建安前夕(147—196)五十年。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以诗、赋为主,兼及《后汉书·文苑传》所著录的颂、箴、铭、诔等文体;政论文不作为文学作品列入考察。

“士风”一词,指士之人格精神、心态作风的一般趋向。本书对士风的研究,以实际生活中士人的言行为主要观察对象,而证之以思想观念的理论表述。前者兼重个别事例的归纳与舆论倾向的追索,以见风尚所趋。后者的引入,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尽管士风影响于文学主要是经由士人心态这一环节,但研究者对感性化的、纷纭复杂的心态、作风,却必须作出理论概括以把握

其脉络层次,明了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本质意义,而当事者的哲学思想、理论主张,本身便是其人格精神、心态作风的升华,联系这一层面的内容,有助于准确深入地把握士人心态的本质。故本书对思想、学术的研讨,侧重由此探视士之生活态度、人格理想,而不求把握其体系。

具体到文学所受士风的影响,本书着重考察的,一是文学活动和文坛格局——主要以文人政治境遇和对皇权依附程度的变化说明宫廷文学的沿革、中下层文坛的崛起与发展,描述从宫廷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到彼此对立、融合的过程。二是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表现手法、审美趣味等风貌——主要以士人心态的变化说明其阶段性特征和递嬗发展的线索,以基本倾向的概括为主,辅以个案分析。研究中不免涉及文学思想和观念,方法上则侧重从文学创作的总体背景观察其所以形成的依据、把握其实质精神与时代特点,估量其意义与影响。

以上是对本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简略说明,也是作者力图遵循的原则。学力所限,疏漏舛误之处,尚祈读者惠予教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两汉之际	(1)
第一节 两汉之际士大夫的政治心态	(1)
第二节 士大夫政治心态的历史背景与观念渊源	(16)
第三节 学术思潮与文艺思想	(34)
第四节 论扬雄赋	(47)
第五节 两汉之际其他赋家	(62)
结语	(73)
第二章 东汉初期	(75)
第一节 谨固自守之风	(75)
第二节 东汉初期士风的政治根源	(78)
第三节 人格价值观念的转变	(92)
第四节 文学活动与文学思想	(104)
第五节 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	(115)
结语	(126)
第三章 东汉 中叶	(128)
第一节 士林分化与狂狷精神之崛起	(128)
第二节 天人新义及其局限	(145)
第三节 宫廷文学的沿革与中下层文坛的繁荣	(156)
第四节 新的创作倾向与审美趣味	(165)

第五节 张衡的心态及其创作道路	(180)
第六节 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思想及其时代精神	(192)
结语	(199)
附录:东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隐士	(201)
第四章 东汉晚叶	(206)
第一节 党锢之祸前后士人心态	(206)
第二节 汉末文人的群体特征	(223)
第三节 赋:抒情化与趣味化的发展	(246)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的精神实质	(261)
结语	(277)
参考书目	(279)
后记	(284)

第一章 两汉之际

西汉王朝自成帝而日趋腐朽，迄于哀、平，崩溃没落已成不可阻遏之势，遂有王莽专权和群雄割据局面出现。从元寿二年（前1）哀帝驾崩、王莽为大司马前后，到建武十二年（36）光武帝刘秀灭公孙述，削平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约四十年间，经过西汉经学培育的士大夫群体，在现实潮流的激荡中，面临着易代之际的种种严峻考验，呈现出独特的心态、作风。本章的主旨是对此加以描述，追溯其历史背景与观念渊源，并进而考察其对文学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主要论述对象，是分别以扬雄（前53—18）和刘歆（前50？—23）、桓谭（前23—56）、班彪（3—54）为代表的三代士人及其作品。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作品创作年代虽迟至建武末年，但作者仍属以上三代士人之列，其思想心态及作品本身的内容情调都具有这一时代的显著特点，因此本章也将其划入论述范围，如冯衍（前20？—60？）的《显志赋》。

第一节 两汉之际士大夫的政治心态

一、“大义未明”辩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曰：“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

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①他以“大义未明”概括王莽居摄时的士风虽不够精确，但指出两汉虽同尊儒术而士风有别，却颇具卓识。循着他所提示的线索，或者有助于揭示两汉之际士风的转折形态。

王莽专政，与元、成以来政权基础的动摇、外戚用权、皇室衰弱有直接关系，但士人的拥戴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莽走上政权顶峰的第一步，便是在满朝文武大臣的推举下实现的^②，随后五年间，从平帝元始元年到王莽居摄以前，大规模的称颂功德频繁见诸载籍，动辄数百上千人。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士人向王莽奉献他们的热情呢？徐复观先生援引王夫之《读通鉴论》，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③。为便于讨论，兹先略述其要点如下：

首先是元帝以来的用人政策造成了士风的颓靡柔弱。王夫之认为元帝以质朴、敦厚、谦逊、有行四科取士，“盖孱主佞臣，怨萧（望之）、周（堪）、张（猛）、刘（向）之骨鲠，而以柔情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读通鉴论》卷四）

其次，成帝、哀帝以来，外戚傅氏、王氏轮掌大权，国家大政成为这两支外戚间的夺权斗争，“二氏之荣枯，举朝野而相激以相讼”，遂使“数十年中原无丈夫之气”。（《读通鉴论》卷五）

最后，王夫之认为仅从现实政治尚不足以解释“合天下奉之以篡”的现象，故又指出：“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

① 黄汝弼《日知录集释》469页，岳麓书社1994年。

②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记载：哀帝崩，太皇太后诏举大司马，“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

③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455—458页，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初版第五次印刷。

术以饰其贪顽。故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周公矣，舜矣，无惑乎其相骛如狂而戴之也。”“经术之变，溢为五行灾祥之说……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废人事……而无能以死卫社稷，非畏祸也，畏公议之以悖道违天加己也。”（《读通鉴论》卷五）对这些由思想、学术而来的士风，徐复观归纳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西汉大思想家，殆无不秉承此义……王莽早先既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则汉室德衰，由王莽取而代之，乃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之实现。”“另一条线索，则是……将天下为公的理想，组入于阴阳消息，五行生克的庞大有机体的构造中，将理想化为由天道运行而来的定命论……于是王莽取汉而代之，乃天命使然，无可反抗。”至此，徐先生指出：“由东汉所开始形成的君臣间的凝固的关系，由宋儒所强调的君臣大义的关系，在西汉知识分子中，是相当地稀薄。”

以上所论三点，多能自圆其说。王夫之所谓两汉之际士风之“柔惰”，尤能切中肯綮。徐氏所论“天下为公”的思想线索，则是对船山议论的发挥，这在西汉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此解释王莽代汉之局也能说明部分原因，但实际情形则远为复杂，至于说君臣大义的观念在西汉士人中“相当地稀薄”，揆诸史实，则每见扞格。以下试加以申说。

士大夫为王莽歌功颂德、进献符命者遍布朝野，可以肯定确有不少人最初对王莽抱有好奇，并寄之以改良弊政的希望，但其中仍有种种复杂的情况。王莽掌政以来，一方面爵封宗室、优礼士人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则“附顺者拔擢，恹恨者诛灭”（《汉书·王莽传》）以固其威权。在这种背景下，士人的称颂、承奉是否皆由衷而发就值得怀疑了。史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汉书·王莽传》）。其中既有慑

于政治高压而虚与委蛇的，如孔光^①；也有阿附权势以贪图富贵的，如甄丰、刘歆、王舜等^②。至于作符命言王莽为真天子而自窜姓名于大臣之列的哀章、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的王恽^③等，更是典型的图私求荣之辈。如此等等，谓之士风“柔情”则得之，谓之“天下为公”则于史未合。这种情况在“奉之以篡”的士人中占有多大分量，至此虽难以确指，但从以下的事例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平帝元始元年，申屠刚对策批评王莽令平帝母远居京外，建言宜遣使征之，置于别宫，旋被罢归田里（《后汉书·申屠刚传》）。同年，大司农孙宝进言“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时大臣皆失色”。不久也被抓住把柄而免职（《汉书·孙宝传》）。此外，还有以引退表现出不合作态度的，如：元寿二年，“大司空彭宣以王莽专权”，乃上书乞骸骨归乡里（《汉书·彭宣传》）；元始二年，“大司空王崇谢病免，以避王莽”；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以王莽专政，皆乞骸骨”（俱见《通鉴》卷三十五）。可见不满王莽专权的朝臣在其居摄前已不少见。“失色”的群臣则别有一层忧惧畏祸之心，随着骨鲠者的被逐，避祸者的引退，朝中剩下的也就是这批人了。

元始三年，王莽长子王宇与其师吴章、妻兄吕宽合谋，以鬼神变怪之事惊惧王莽，欲使平帝母卫后至京师。事泄，皆被杀。王莽遂穷治党与，“上党鲍宣，南阳彭伟、杜公子，郡国豪桀坐死者数百人。”（《汉书·何武传》）被杀的数百人中，其不依附王莽，是等同于王夫之所批评的成、哀之世“二氏之荣枯，举朝野而相

① 《汉书·王莽传》：“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令郁持与（孔）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

② 《通鉴》卷三十七，具体事迹见下文。

③ 俱见《通鉴》卷三十六。

激以相讼”的意气之争,还是出自对刘汉皇权的忠心?从王宇所表现出的对皇室的同情来看,后者是难以一笔抹杀的。不管怎样,上述对王莽或曲意依附、或心怀不满的两类士人,都不在少数,却都与“天下为公”的理想无涉。于是,不仅“合天下奉之以篡”的印象需要打个折扣,而且,以“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来解释士人对王莽的推戴,看来也只道出了一部分事实。

吕宽之狱,已有“海内震焉”的反应,翌年又发生了“增法五十条”的事件,触犯者均被徙之西海郡,“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汉书·王莽传》)随着王莽即真之谋日渐显明,士人避祸而去者日众,起兵谋反者也开始出现了,王莽政权的离心力加剧了。这些都是为人熟知的史实,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士人心态的转变。徐复观指出,扬雄对王莽的关系,“在王莽未篡汉以前是一种态度,对王莽篡汉以后另是一种态度”,大致而言,王莽在平帝时代的设施,扬雄视为汉室极盛之时,“是他此时不以为王莽会有篡汉的阴谋”,而在元始五年王莽加九锡后,则“对王莽之篡,在心理上并不以为当然”,甚至有所批评。徐氏以为“这是扬雄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的表现”^①。然而,据《后汉书·逸民传》所载:“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可见不满王莽篡位而清高自持的,并不是个别现象,只不过时有早晚而已。以下先摘录几条史料,再分别加以辨析:

1、“至元始中,王莽颛政,(梅)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汉书·梅福传》)

2、“王莽杀其子宇,(逢)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而去。(《后汉书·逸民传》)

^① 《两汉思想史》卷二,459—460页。

3、“莽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莽又风群臣奏莽功德，称宰衡……光愈恐，固称疾辞位”(《汉书·孔光传》)

4、“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则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秀内惧而已。”“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寝剧，死。”(《汉书·王莽传》)

5、始建国三年，王莽遣使者拜龚胜为师友祭酒，胜固辞。不许。胜谓其门人曰：“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遂绝食而死。(《汉书·龚胜传》)

6、“莽居摄，(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7、“哀、平之际，沛国陈咸以律令为尚书。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鲍宣死(按：何、鲍均死于吕宽之狱)，咸叹曰：‘《易》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咸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钦、丰皆在位，咸悉令解官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悉收敛其家律令、文书，壁藏之。又齐栗融、北海禽庆、苏章、山阳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通鉴》卷三十七)

8、卓茂，王莽秉政时尝为京部丞，“及莽居摄，以病免归郡，常为门下掾祭酒，不肯作职吏。”“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后汉书·卓茂传》)

9、周党，“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王霸，“及王莽篡位，弃冠

带，绝交宦。”戴遵，“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后汉书·逸民传》）

10、蔡茂，“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后汉书·蔡茂传》）

可见在汲汲求进者屡献符命的同时，对王莽篡汉感到忧惧或不满，在士林中实不少见。早有预见者如梅福固已及时抽身引退；见之较迟者或寄望于王莽改良弊政（如扬雄，徐复观已辩之），或心怀贪图利禄之私（如甄丰、刘歆、王舜等）。一旦觉察到王莽有篡汉的野心，态度便都发生了转变。甄丰、刘歆等人，虽已富贵而“畏汉宗室、天下豪杰”，孔光因王莽羽翼渐丰而愈觉惶悚，则刘汉王朝之旧臣已开始为自己即将成为贰臣而感到恐惧——王莽的心腹重臣尚且如此，士林舆论之一般倾向可以想见。陈咸的事例更典型地说明了士大夫对王莽态度的变化发展——先是对改制不满，继而因政治恐怖而避祸，最后因其篡位而在政治上倾向刘汉王朝。上引龚胜、郭钦、蒋诩、栗融、周党、王霸、卓茂等人，均与陈咸同此立场，而龚胜所谓“谊岂以一身事二姓”，则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卓茂辈以不仕莽而“名重当时”，又其时各路起事者，亦多以拥刘为号召（详下文），益可见人心之系于汉室。

总之，士人对王莽的推戴，并不意味着拥护王莽取汉而代之，他们最多只是把挽救腐败政治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当代周公身上，最后仍希望他仿周公故事还政于王。当群臣上疏太后请王莽居摄时，有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汉书·王莽传》）即此之谓。及见王莽无归政之意，乃有士人利用符命说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后汉书·郅恽传》）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这种心态。

所以代汉的野心一旦暴露，士人对刘汉皇室的忠心便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但势有不得不然，待到王莽羽翼已丰，居摄、即真遂成不可逆转之局。但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明王莽代汉的成功意味着“凝固的君臣观念的稀薄”。被班固誉为“见险而止”的彭宣，却受到王夫之激烈的批评：“若宣者，位司空为汉室辅，王莽杀两后，诛异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此正宣肝脑涂地、激天下忠烈之气、以救一线之危者，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谋，谢不能以引退，尚足为人臣子乎？”^① 虽或责之过苛，但由此亦得见其时士林风气之一斑——此正船山所谓“柔情”也。那么，顾炎武所谓“大义未明”，是需要加以具体界说的。从上文的辨析已可看出：他们并非不谙君臣大义，而只是对维护君臣大义缺乏积极性——或贪慕荣禄以求进，或慑于政治恐怖而引退，上焉者亦仅得以“不事二姓”自守而已。但即使是干禄求进之徒，也不能不畏惮士林之公议，更遑论引退自守之士的心系汉室。这些现象很难以“大义未明”加以概括，其所以如此则另有原因，这且放到后文去说。附带说明一下，我们无意把两汉之际的政局归结为士人的性格因素，而只是通过一个特定的事件对士风的真相加以观察。

二、现实功利与节义忠信

随着王莽政权逐渐丧失民心，起兵反莽者日众，群雄混战的时代到来了。当时割据一方的军阀多能注意罗致士人为其所用。其中犹著者如隗嚣，“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等皆奔归嚣。嚣素谦恭爱士，倾身接为布衣交。”（《后汉书·隗嚣传》）公孙述也倾心征聘享有高名之士（《后汉书》本传），至于刘秀集团中

^① 《读通鉴论》卷五，114页，中华书局1975年。